

孫中山、譚延闓與駐粵湘軍

——湘系力量如何匯入南方革命陣營*

李在全

[提 要] 1920 年代上半期,湖南是南北競逐中的“搖擺”省份,其向背直接影響全國政局走向。在孫中山支持下,廣東革命政權中的湘籍要員譚延闓於 1923 年 7 月重返湖南,與傾向北方的趙恒惕爭奪湘政,雖然未達目的,卻成功從湖南分離出來一支三萬餘人的武裝力量。該軍進入廣東後,形成“駐粵湘軍”,參與諸多軍事行動,既深刻改變了粵省軍政格局,也使這支部隊自身經歷了重大改造。駐粵湘軍在困境中人數銳減,後在廣東軍政統一進程中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在蘇俄與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國民黨中央向該軍派遣大批政治工作幹部,意在將其改造為“革命軍隊”,成效顯著,但該軍總體上仍保留著濃厚的湖南地域色彩。不管如何,這支來自湖南的軍事力量,幾經改編與改造,最終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既助推了廣東革命政權的迅速崛起,也成為 1926 年廣東出師北伐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

[關鍵詞] 孫中山 譚延闓 湘軍 客軍 廣東革命政府

[中圖分類號] K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6) 02 - 0188 - 14

1926 年 7 月,廣東革命政府發動北伐戰爭,迅速攻佔兩湖,未及半年,其控制區域即從珠江流域擴展至長江流域。同年底,廣東革命政府遷都武漢,後因國民黨內部紛爭,引發寧漢對峙。1927 年下半年寧漢合流,南京國民政府進行“二期北伐”,於 1928 年推翻北洋政權,建立起國民黨在全國範圍的統治。1926 年至 1928 年間的這場南北易勢和政權鼎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軍政巨變,影響深遠。從 1923 年初孫中山第三次開府廣州,到 1926 年出師北伐,廣東革命政府在短短三年內迅速崛起,凝聚足以改變全國政局的力量,其原因何在?

除了蘇俄、共產國際的支持以及國共合作等人們所熟知的因素之外,尚有一個較少為人關注的重要方面,即來自廣東以外各方力量的匯入。在這一時期,廣東(至少在形式上)曾駐有十三個省份的軍隊。^①外省力量,特別是軍事力量的匯入,是該時期廣東軍政格局的一個顯著特徵。其中,譚延闓率領的駐粵湘軍就是一支重要力量,值得專門考察。近年來,隨著《譚延闓日記》的整理與利

* 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學科建設“登峰戰略”資助計劃資助(編號:DF2023YS17)。

用,譚延闓逐漸成為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人物之一,相關成果不斷湧現。^②關於譚延闓所部湘軍,學界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③囿於當時條件所限,尚未利用《譚延闓日記》、《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等關鍵史料,因此仍有進一步探討和深化的空間。

一、譚延闓加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陣營

譚延闓(1880~1930),字祖庵(又作組庵、組安),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出身官宦之家,其父譚鍾麟官至陝甘總督、工部尚書、閩浙總督、兩廣總督等要職。清光緒三十年(1904),譚延闓中進士,後任長沙中路師範學堂監督及湖南省教育會長,開湖南私立師範教育之先河。宣統元年(1909)出任湖南省諮議局議長,發起組織憲友會,成為清末立憲運動領袖人物之一。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在變亂的湖南政局中,譚延闓出任湖南都督。北洋時期,他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在湘省積累了深厚的人脈資源與政治資本。1923年2月後,譚延闓追隨孫中山南下廣東,被任命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內政部長、建設部長。其時湖南內部紛爭激化,同年7月孫中山委其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進駐湘南,擁護譚氏的湘軍將領紛紛聚集麾下,初步形成譚部湘軍,與傾向北方的湖南軍閥趙恒惕爭奪湘政,譚、趙戰爭爆發。不久因陳炯明進攻廣州,孫中山急命譚延闓率部南下援粵,譚部湘軍進入廣東後正式組建為駐粵湘軍,參與廣東諸多軍事行動。憑藉所部湘軍,譚延闓在廣東革命政權中地位日隆,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9月任建國湘軍總司令,11月孫中山北上後,譚出任北伐聯軍總司令主持北伐事務,不久兵敗贛南,北伐未果。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中央常務委員,旋代理政治委員會主席。1928年2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10月轉任行政院長,1930年9月病逝於南京。

作為清末立憲派首領之一,譚延闓本與孫中山素無淵源,但在民國初年的動盪時局中,兩人漸有交集。1912年民國建立後,在孫中山、黃興等支持下,宋教仁聯合小黨派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廣納各方人士以擴大黨勢,希冀通過選舉造成國會第一大黨而謀取政權。其間,經宋教仁、黃興等湘籍人士運作,時任湖南都督的譚延闓加入國民黨,並被推舉為湖南支部長。此乃譚氏與革命黨人的初步接觸,但雙方並未真正攜手。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袁世凱集團與革命黨矛盾激化,7月“二次革命”爆發,譚延闓持觀望態度,未與革命黨人合作。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後,於10月免去譚延闓湘督職務。此後譚閒居青島、上海等地,與胡漢民等人交往較密,得以結識孫中山。

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國務總理段祺瑞掌控實權。8月,譚延闓第二次出任湘督。隨後府院之爭導致1917年7月張勳復辟,譚延闓因在府院之爭中傾向黎元洪,加之湖南為南北競逐的關鍵省份,8月段祺瑞免去其湘督職,由皖系將領傅良佐接任,譚氏再度離湘赴滬。此時孫中山正領導護法運動,譚延闓為重返湖南,於1918年4月離滬南下兩廣尋求支持,12、13日在廣州與孫中山會面,“談甚久”。譚氏雖覺孫主張“亦有見地”,^④但雙方缺乏深入了解與共識,尚無合作基礎。此時孫中山在護法政權內部處境艱難,譚延闓旋即離粵轉赴廣西,尋求桂系陸榮廷支持。在陸榮廷支持下,1920年上半年譚延闓在湖南驅逐張敬堯,7月第三次出任湘督,宣佈“聯省自治”,試圖以地方自治為旗號,使湖南超然於南北紛爭之外。同年孫中山討伐桂系時,因譚延闓與桂系關係密切,孫、譚之間頗有矛盾。譚氏第三次督湘期間,湖南內外矛盾交織,加之部屬趙恒惕的壓迫,1920年底譚被迫離湘,再度閒居滬上。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兵變,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陷入苦悶並進行新的探索。政局波動與時代氛圍轉變,使得孫、譚這兩位政治上失意的人物在

上海逐漸走到了一起。

1922年至1923年《譚延闓日記》顯示，此期間他與各方保持密切聯繫，密使往來頻繁，與孫中山的交往尤為頻密，思想理念亦日益接近。1923年1月13日，譚延闓往訪孫中山，遇張繼、廖仲愷等人，“入見中山，談久之”。^⑤他逐漸放棄此前聯省自治的建國理念，轉而與孫中山接近。近代湘籍名士石醉六長期為譚氏智囊，此時亦在上海，與譚往來密切。石氏後來憶述：“（1920）十月我攜同家族安住上海，直到十二年二月，與譚延闓、岳森、呂苾籌等幾無日不相見。譚的政治生活在這一期間轉變了方向”，1922年8月“孫（中山）被陳炯明危迫來到上海，孫、譚從此沆瀣一氣，與聯省自治派脫去糾纏”。^⑥譚延闓對湖南政局動向極為關注，與湘籍將領趙恒惕、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陳嘉祐等均函電交馳，密切聯繫。即使反對譚氏的趙恒惕晚年亦承認：“譚公之性格極圓融沖和，待人親切而周到。”^⑦這一時期湘西矛盾日劇，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述：1923年1月3日，湘籍要員陳嘉祐等人來訪，“言赴湘西事”；14日，客來“言湘中事”；21日，陳嘉祐、張輝瓚、朱劍帆等人來訪，“談湘中近事”。^⑧不僅譚延闓關注湘政，湖南不少軍政要角也惦念著他，“從湘軍內部情況看，譚延闓雖已遠走上海作寓公，並未忘情於湖南，譚派勢力仍然不小，都希望老上司捲土重來”^⑨。

1922年6月陳炯明兵變後，孫中山於8月被迫離粵赴滬，但他一直聯絡各方，特別是楊希閔滇軍和劉震寰桂軍，準備奪回廣州。1923年初此計劃成為現實。2月，孫中山回粵重新組建政權，邀請譚延闓同行。2月12日，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載：“詣孫（中山），訪石（醉六）、張（輝瓚），決行”，“詣中山，已決於後日往粵，同舟往，細思亦不能不行，遂許諾出，過（石）醉六，久談，復至厚福里與石侯（張輝瓚）及姜、周諸人談，偕張石侯還家，護芳（陳嘉祐）亦至，因同飯，呂滿、廩丞來，以中山所交二萬元相付，即與陳、張諸人共處分之”。當然，譚延闓離滬赴粵也有生活方面的原因。因長期居滬上，經濟來源頗為拮据，1923年1月7日譚氏記述：“近日頗有來詢吾潤格者，賣字之心油然而生，近來囊底已空，不能不計及此矣。”2月15日舊曆除夕，譚延闓由滬南下廣州，此後日記譚氏自謂為“南征日記”。^⑩不可否認，孫中山邀請譚延闓同赴廣州亦有其自身考量：“孫先生以譚曾三次主持湖南軍政，雖然新近為趙恒惕所扼，但他在湖南的舊部不少，潛力很大，利用譚之東山再起，或可收打通北伐通道的效果，乃攜譚赴廣州。”^⑪

1923年3月2日，孫中山在廣州組建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自任大元帥，統率各軍，並委任譚延闓為內政部長。^⑫對於處在戰爭狀態中的廣州大本營而言，內政部實為虛名機構，無甚權力。3月10日譚延闓記述：“吾於內政部本謂僅擁虛名，今乃被促，不能從事組織，又多一麻煩也。”^⑬在內政部長任上不及兩月，5月譚延闓改任建設部長。^⑭5月28日，譚前往建設部就職，該部辦公場所就是一個大廳，“往至財政廳側一大廳，所謂建設部也”。^⑮無論內政部長還是建設部長，對譚延闓而言皆屬掛名，他心中所念始終是湖南政局。

二、譚、趙戰爭與駐粵湘軍的形成

1923年湖南政局變動劇烈，首先從湘西引發。湘西政局的變化，與陳嘉祐、蔡鉅猷等湘省軍政要角密切相關。陳嘉祐，字護芳，湖南湘陰人，其父陳炳煥（號樹藩）長期在譚延闓部擔任要職。陳嘉祐早年就讀於長沙明德中學，在此期間認識了在該校任教的黃興。後赴日本留學，經黃興介紹得識孫中山，並加入同盟會。陳隨後入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辛亥革命前回國，一度在湖北任標統，旋即回湖南軍中任職。因其父與譚延闓的特殊關係，在譚三次督湘期間，陳嘉祐均在譚部擔任軍職，“他（陳嘉祐）的前段道路，也就隨著譚的三起三落而坎坷不平”。陳是擁譚派的中堅人物。

1920年譚延闓第三次督湘，不久被部屬趙恒惕逼迫離湘，趙遂主政湖南。陳作為譚之舊部，“素為趙所嫉視，此時陳、趙間的嫌隙更深了”。1921年冬，孫中山派湘籍要員周震麟為湖南勞軍使，留駐郴縣聯絡陳嘉祐，陳自此暗中接受廣東政府指揮，“趙察知其事，對陳更加懷恨，必欲去之而甘心”。1922年5月，孫中山任命陳嘉祐為“討賊軍湘軍第一路司令”。^⑩在與趙恒惕的較量中，陳嘉祐處於劣勢，軍隊損失頗大，餘部避往湘西，陳本人則離湘赴滬，與譚延闓會合。^⑪

攪動湘西政局的另一位要角是蔡鉅猷，字鑄人，湖南益陽人。早年入湖南武備學堂就讀，畢業後進入湖南新軍任職，先後參加辛亥革命長沙起義、1915年反袁護國戰爭、1917年護法戰爭等，在連年戰亂與動盪的湖南政局中，其勢力逐漸壯大。到1920年前後，蔡鉅猷已據有沅陵、瀘溪、辰溪等縣，擁兵25營，深得譚延闓倚重，擔任沅陵鎮守使，掌控湘西實權。^⑫

從1915年護國戰爭以來，湘西在湖南軍政格局中便具有較高的獨立性，與湖南當局維持著半獨立狀態。同時，湘西的鴉片貿易與稅收，引發各方爭奪。湘軍將領方鼎英晚年曾直言：湘西乃“烏金”之地，不僅雲貴等省的鴉片煙土多經湘西轉運漢口，且湘西各縣自種鴉片者亦為數不少，各方權勢人物“睹此禁臠，莫不垂涎欲滴”。北洋時期由爭奪湘西而引起的多次戰爭，“表面上雙方都說得振振有詞，實際上是因鴉片問題引起的，也可以名之為‘鴉片之戰’”。^⑬另一位湘軍將領戴岳也認為：“趙恒惕與蔡鉅猷之戰，不管雙方有什麼藉口，實質上是一場爭奪鴉片煙稅的戰爭。”^⑭趙恒惕控制湘政後，自然力圖掌控湘西，遂與盤踞該地的蔡鉅猷等人矛盾日劇。因此，湘西成為挑戰趙恒惕、引發湘政變動的肇端之地。

1923年2月，孫中山偕譚延闓由滬抵粵，重組政權。在此前後，陳嘉祐亦赴湘西活動，聯絡沅陵鎮守使蔡鉅猷，密謀起兵反趙。5、6月間，蔡鉅猷以換防為名，提兵向安化、益陽推進。趙恒惕隨即下令裁撤沅陵鎮守使一職，調任蔡為湖南省講武堂總辦，其所部兩個旅改歸湖南陸軍第一、二兩師節制。趙恒惕撤免蔡鉅猷的舉措，各方為之震動。衡陽鎮守使謝國光、武岡鎮守使吳劍學、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及第二師師長魯滌平等，均有唇亡齒寒之憂，認為昨日討伐陳嘉祐，今日撤免蔡鉅猷，下一步便將輪到自己頭上。他們希望趙恒惕知難而退，保全蔡的地位，同時又不致與趙破裂。他們一方面電促蔡退兵，一方面請趙收回裁免蔡職的成命。謝、吳、宋、魯聯名通電，主張湘西問題和平解決。^⑮此時戰爭雖尚未爆發，但湖南內部的對壘態勢已露端倪。趙恒惕晚年也承認，其時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平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組等；舊派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劍學、魯滌平、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等。^⑯趙氏所言，意甚明了——其本人為新派領袖，而譚延闓則為舊派首領。

對於這場由湘西引發的劇變，身在廣州的譚延闓高度關注。這在譚氏日記中多有體現：1923年5月31日，“與周鼇山、鍾仙莊談湘事，皆以速往為宜，復與（石）醉六談久之，乃知能者周不多也”；6月1日，“與（石）醉六、宏群（岳森）商湘電事”；6月3日，“談湘事甚久”。關鍵時刻，各方密使往返頻密，6月17日，譚見吳某，此人係“魯詠安（魯滌平）所使也”；6月25日，“蕭養晦者來自辰州，云護芳（陳嘉祐）所使，然無信也”；7月4日，“周鼇山忽來，義形於色，云湘西事發，吾當速歸，欲即見滄白（楊庶堪），吾婉謝之……岳爺得粟海槎電，僅‘趙令免蔡’四字”。^⑰

面對湘局劇變，孫中山、譚延闓等人密集商議應對之策。1923年7月8日，譚延闓至大本營，將陳嘉祐相關消息報告孫中山，孫、譚“談進行計劃久之”；9日，“大元帥明當復往，吾計行矣”，“得蔡（鉅猷）電，知決心與湘當局戰，猶恨其遲也。”10日，譚派要員彙聚譚宅，“皆計行事者，商榷甚

久”，譚至大本營，“見孫先生言湘西事，遂決行事”，午後又“見孫先生，以橫磨劍見畀，足壯行色”；是日，孫中山發給譚延闓回湘經費十萬元。^{②1}11日，“吾將行，而帥令喚商湘事，奏對久之”；15日，有人“自湘西來，云事有把握，為之一慰”。^{②5}

與此同時，1923年7月，湖南內部雙方已開始調兵遣將。趙恒惕已派第一師賀耀組旅由益陽進攻淑浦，唐生智旅由常德進攻辰州（沅陵）。蔡鉅猷的處境已成騎虎之勢，遂宣佈就任孫中山所任命的湘西第一軍軍長，“擁護元首不易初衷”，並列舉趙恒惕在湖南的種種罪過。^{②6}蔡分兵三路，由劉敘彝、田鎮藩、周朝武率領，向常德、安化、新化等方面進攻。^{②7}蔡、趙戰爭爆發，這也為譚、趙戰爭拉開了序幕。

湘局瞬息萬變，孫中山、譚延闓力主積極、直接介入。1923年7月16日，孫中山任命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蔡鉅猷為湖南討賊軍湘西第一軍軍長，陳渠珍為湘西第二軍軍長；謝國光為湘南第一軍軍長，吳劍學為湘南第二軍軍長；宋鶴庚為湘中第一軍軍長，魯滌平為湘中第二軍軍長。^{②8}24日，譚延闓、楊庶堪、胡漢民一同拜見孫中山，孫曰：“今日當以革命手段挽救國家，一切法理論皆用不著，即如湘事，事實奉大元帥令，精神奉黨魁命，譬如對滿清宣戰，豈有退轉，應一切不顧不理，以服從命令達到任務為歸。”次日，譚延闓在石醉六、岳森、張輝瓚等二十餘名部屬陪同下，離粵赴湘。^{②8}8月7日，譚延闓抵達衡陽，就任湖南省長兼北伐討賊軍總司令，並組織公署。

譚延闓入湘討伐趙恒惕，導致湘軍分裂更趨明顯。賀耀組、葉開鑫、唐生智等旅長及所屬十七個團長發表通電，明確表達反譚擁趙的立場；蔡鉅猷、陳嘉祐、謝國光、吳劍學等人則站在譚延闓陣營；湖南陸軍第一師師長宋鶴庚、第二師師長魯滌平，內心傾向譚延闓，但因所部擁趙力量強大，只能暫時保持“中立”姿態。宋、魯二人此時在湘軍中位高權重，僅次於趙恒惕，他們的“搖擺”姿態，令譚延闓深以為憾。8月17日譚記述：“冠軍（吳劍學）來，出宋（鶴庚）、魯（滌平）電，仍以調停為言”；19日，“得宋、魯主張和平電”；24日，岳森“自湘鄉歸，言宋、魯態度備悉，使人太息”。^{③1}譚、趙戰爭爆發後，雙方人馬相持於株洲、醴陵一帶。

譚、趙雙方雖劍拔弩張，但並未完全撕破臉皮，和戰交織並行。此時湘軍將領中主張和平的氣氛依然濃厚。宋鶴庚、魯滌平主張議和，避免戰爭。8月23日，趙恒惕下達總攻擊令，趙軍接連取勝，譚軍後撤。就在這時，隸屬魯滌平師葉開鑫旅的團長朱耀華，受張輝瓚、方鼎英等策動，倒向譚方，9月1日引兵突襲長沙，毫無防備的趙恒惕倉促逃往醴陵，譚、趙戰爭“局面有急轉直下之意矣”。^{③2}後趙得直系吳佩孚支持，召集所部於13日重新佔領長沙，譚軍退出。14日，魯滌平發表通電，提議雙方停戰和談。於是，雙方在湘潭姜畚議和。對於議和，譚延闓感慨道：“停戰空氣既濃，士官皆有厭兵之意，則此行目的將不達矣。”^{③3}姜畚和平談判持續一個多月，未果，10月戰事再起。

此時趙恒惕得到吳佩孚支持，直系軍隊進駐岳州、常德一帶。在譚、趙之爭中，趙方漸佔優勢，譚軍退往湘南。但是，隨著直系軍隊介入湖南內戰，加上其他因素，原先持“中立”態度的魯滌平、宋鶴庚也轉而加入譚方。正在此時，陳炯明所部進攻廣州，形勢危急，孫中山急令譚延闓回師援粵。11月13日，譚延闓率領所部湘軍進入廣東，譚、趙戰爭至此結束，趙恒惕控制了除湘西之外的湖南大部分地區。由此，譚延闓所部成為“駐粵湘軍”。

身在廣州的孫中山密切關注湘局變化，起初他與譚延闓函電往返，溝通信息，勉勵譚“猛力毅進”解決湘局。^{③4}9月，孫中山派朱培德所部滇軍赴湘支援，前鋒已抵湘境，後因東江戰事未息，惠州城尚未攻下，陳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部由閩邊移至，以圖解惠州之圍，孫遂不得不再將朱部調至惠州，並表示待東江問題解決後，各軍“皆可入湘，以定全局”。^{③5}囿於廣東內部局勢，孫中山對湘局的

支持僅限於口頭，實際上無能為力，無法給予切實支援，關鍵時刻反而需要湘軍入粵救援。對於湘局與南北時局變化，有報紙分析道：譚軍離湘入粵，湖南又陷北軍之手。就廣東而言，孫軍得譚部援助，在廣東當有立足之餘地。然而，就整個西南而言，湖南為北軍所得，不再是中立省份，無法再起到緩衝南北局勢的作用。廣東戰事尚無結束之日，隨著湖南為北方所控制，南北勢力直接接觸，難免發生進一步衝突。該報感歎：“苦哉吾民，何時始離刀兵之危，而見和平統一之天日乎”。^⑤此分析頗為在理。

三、駐粵湘軍的戰事與處境

譚延闓率軍由湘南退入粵北，部眾達三萬餘人，攜槍一萬五千枝。^⑥自此，這支湘軍開始參與廣東諸多軍事行動。

其一，參與援救廣州。11月17日，譚延闓抵達韶關，次日趕赴廣州，與楊庶堪、廖仲愷、孫科、伍朝樞、吳鐵城等人會面，隨後同赴大本營拜見孫中山，“極蒙嘉慰，深說久之”。^⑦此前數日，陳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近逼廣州，廣東革命政權岌岌可危，孫中山急令譚延闓率師回援。譚率部迅速回粵，待抵達廣州時，局勢已然好轉。譚部雖未直接參與廣州解圍之戰，但一支數量龐大的湘軍入粵，頗具威懾力，對改變廣東軍政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二，投入粵北南雄、始興戰役。廣州雖已解圍，廣東局勢依然危殆，孫中山不得不倚重這支新來的湘軍以應對亂局。此時，北軍方本仁乘東江陳炯明部進攻之機，從贛粵邊境大庾嶺進犯粵北，佔領南雄，欲進窺始興。駐防南雄、始興之滇軍節節敗退，粵北重鎮韶關岌岌可危。11月20日，孫中山命北江各部隊由譚延闓指揮，督率各部迅速進剿，“務先鞏固邊陲，再進以圖大局，現在北江各部隊著歸該總司令指揮調遣”。湘軍入粵後，指揮系統有所調整：譚延闓仍為湘軍總司令，常駐廣州；宋鶴庚任湘軍總指揮，因其尚在上海，故由魯滌平代理總指揮，實際指揮粵北戰事。湘軍編為六個軍，軍長依次為宋鶴庚、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蔡鉅猷、陳嘉祐，宋鶴庚未到任前，第一軍軍長由方鼎英代理。^⑧

湘軍初至廣東，人地生疏，兵疲糧乏，處境異常艱難。方鼎英後來憶述：湘軍官兵初入粵境，語言不通，習俗迥異，又缺糧餉醫藥，加以粵人聚族而居，築有炮樓碉堡，一見湘軍開至，連牲畜物資一概搬入碉堡，形成堅壁清野之勢。湘軍倉促南來，不僅無處購食，甚至連問路亦不可得。軍中時常斷糧，有時連一餐紅薯也吃不上。^⑨不少湘軍將領對入粵後的前途並不樂觀，^⑩這自然影響到軍心與士氣。在如此艱難狀況下，湘軍能否勝任嚴峻的粵北戰事，頗令譚延闓憂心。11月22日，譚在日記中寫道：“湘軍疲困又無補充，今當大敵，殊為惴惴。”但形勢危急，只能投入戰鬥，“以事勢論湘軍，如不加入，則北江不可問，惟有努力耳”。24日，北江湘軍與滇軍在水南會合，26日在始興以南連戰皆捷，收復南雄、始興，穩住了粵北局面。12月1日，譚延闓寫道：“昨早克始興，得槍過千，砲及機槍各數枝，俘虜五百餘，然敵仍在十里外抗戰，今早電尚未擊退，而子彈已乏，故可慮也。”^⑪12月初，湘軍和滇軍將北軍逐出粵境，12月11日，孫中山下令嘉獎在北江作戰有功之湘、滇軍官兵。^⑫

粵局大體得以維持，1924年1月，國共合作的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此時廣東駐軍龐雜，除本土粵軍外，尚有眾多客軍，勢力最大者為楊希閔滇軍，其次為劉震寰桂軍。三萬多湘軍入粵，深刻改變了廣東既存的軍政格局，在增強武裝力量的同時，也引發諸多矛盾。據報載，滇軍以湘軍戰敗來粵，並無顯赫戰功為由，頗有不服之意，楊希閔曾對人言：“湘軍為中山庶出之愛子，彼不過中山之私生子。”又有報道稱，孫中山“密調湘軍各將領於廣州以監視滇軍”。不僅湘軍與滇軍之間產生

矛盾，土客矛盾亦隨之加劇，“湘、滇兩軍勢力日趨膨脹，已形成反客為主之景象”，引發粵軍高度警覺，粵籍軍人逐漸聯合以對付外來客軍，由此形成滇、湘、粵軍彼此矛盾重重、互相牽制之局。^④粵軍為本地武裝，滇軍入粵已久且勢力強大，因此後至的湘軍處境更為艱難，防區駐地、武器糧草供給等均成問題，譚延闓曾向胡漢民、汪精衛、戴季陶等人“痛言湘軍之困苦”。^⑤

其三，進兵東江討伐陳炯明。國民黨一大後，1924年2月，孫中山決定先肅清東江陳炯明所部，再出師北伐，命湘軍參與東江討陳行動，擔任左翼進攻任務。4月起，湘軍攻克龍門、響水、河源等地，與滇、桂軍合圍陳炯明老巢惠州。東江戰事中，由於滇桂軍不配合、軍餉不繼、水土不服、瘟疫流行等原因，湘軍行動極為困難，傷亡慘重。6月17日，宋鶴庚來見譚延闓，“談前方情形，軍氣萎靡，病者過半，日有死亡，惟以和為望，言之可傷”。^⑥在如此艱難環境中，湘軍由初到粵時的三萬餘人、槍一萬五千枝，“後因在東江久戰，死亡極多，槍枝亦有損失，現有眾約二萬餘人，槍一萬二千餘枝云”。^⑦

在傷亡慘重的情況下，湘軍中流傳著四句令人心酸的話：“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藥，死不得埋”，^⑧其生存之艱難可見一斑。艱難處境也使湘軍內部軍心更加不穩。6月11日，湘軍內部有回湘之擬議，部分將士認為，“照現在情形觀察，我軍除回湘外，確無生存之可能”。湘軍暗中運動回湘，引起孫中山關切，6月23日他詰問譚延闓，譚許諾打消此議。進退維艱之際，湘軍第六師師長王得慶投靠陳炯明，影響惡劣，孫中山遂下通緝令。^⑨此次東江戰事延續至9月，後因廣州商團叛亂，湘軍從東江前線回師廣州參與平亂。東江之戰未達原定目標，未能肅清陳炯明所部。

其四，出兵北伐贛南。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為共同討伐直系，同時化解廣東內部矛盾，孫中山決定出師北伐，命湘、贛、豫軍等參加，並親赴粵北韶關督師。北伐軍集結部隊大致如下：譚延闓湘軍（5個軍13個師）13,000人；樊鍾秀豫軍1個軍5,000人；贛、陝、晉和閩系將領指揮的閩軍3,000人；廣州政府軍政部長、湘軍將領程潛所部2,000人；吳鐵城的廣州警衛旅2,000人；共計25,500人。^⑩10月13日，孫中山訓令各軍編為建國軍，駐粵湘軍編為建國湘軍，總司令為譚延闓，湘軍第一軍軍長兼湘軍總指揮宋鶴庚，第二軍軍長魯滌平，第三軍軍長謝國光，第四軍軍長吳劍學，第五軍軍長陳嘉祐。^⑪各軍編制與人數如下：第一軍轄4個旅，步兵4,000人；第二軍轄3個旅，步兵約3,000人；第三軍轄4個旅，步兵約2,500人；第四軍轄3個旅，步兵2,500人；第五軍轄2個旅，步兵2,000人。^⑫

按孫中山部署，湘軍進攻江西，但湘軍內部對此意見不一，有人主張進兵湖南。譚延闓記述：召集宋鶴庚、陳嘉祐等將領到住處商議計劃，“決計北伐入贛，聞吳八、弗燾皆力主入湘，自云順兵心，不知兵心思歸乃回家，非打仗，豈可順乎。不願打仗，留之何益，逃不足怪，吾豈須恃此兵為生活耶。”^⑬可見湘軍內部軍心不穩、人心不齊。

南方軍隊厲兵秣馬，北方政局亦暗流湧動。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形勢突變，隨後馮玉祥、段祺瑞等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多方權衡後，孫中山決定北上，行前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命譚延闓為建國北伐軍總司令主持軍務，北伐各軍歸其節制調遣。然而各軍之間頗難協調，即使湘軍內部，矛盾也不小。湘軍中地位僅次於譚延闓的宋鶴庚與魯滌平本有嫌隙，此時又生齟齬。11月8日譚氏記述：“詠安（魯滌平）來，飯後，熙農（吳劍學）至，正談笑間，阜南（宋鶴庚）乘醉入，大與詠安鬧意見，積隙已深，倚醉發揮，不必盡為改道異同，然而將帥不和，師行可慮，為之憂憤。”^⑭11月，譚延闓令湘軍及各軍北伐贛南，起初進展勝利，佔領贛州、吉安等地。不料湘軍前敵總指揮宋鶴庚輕敵冒進，12月下旬陷入敵軍埋伏，湘軍潰敗，損失慘重。1925年1月1日，譚

延闓從前線歸來者了解戰況，知悉“此次失敗，罪在湘軍，始則輕敵，繼則兵不用命，遂大崩潰，累及友軍，壞及國事”。3日，參與北伐的滇軍將領朱培德與譚延闓相見，“談戰事甚悉，輕敵居其半，士不用命居其半”。^⑤多方商議後，譚延闓決定放棄贛州，退守粵北。湘軍離湘征戰，本就軍心不穩，加之贛南慘敗，在湖南趙恒惕引誘下，宋鶴庚率謝國光、吳劍學部逃回湖南，後被趙恒惕解散，這成為譚延闓“一生最痛心事”。^⑥據蘇俄軍事顧問記述：贛南戰敗後，“撤退到遂川的湘軍發生了嘩變。士兵們要求解散隊伍或者將他們送往湖南，聲稱湖南人不適應廣東的氣候，所以他們在那裡非常痛苦，不能再到廣東去了”。^⑦兵敗贛南引發廣東各方聯動，1925年1月3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湘軍在江西失敗，東江逆敵，林虎擬出贛，南撲滅湘軍與北伐軍，而促陳逆反攻省城”；6日，蔣介石又記：“與汝兄（許崇智）總司令商議時局，北伐湘軍已退出贛州。”^⑧兵敗贛南、北伐失敗直接導致湘軍整頓和改造。

其五，參與平定滇、桂軍之亂。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廣東的楊希閔滇軍和劉震寰桂軍更加不聽號令，並暗中聯絡滇系唐繼堯，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廣東政府決心武力解決滇桂軍問題。對此次軍事行動，譚延闓內心頗為矛盾，不僅因為滇軍勢力強大，也因為滇、桂軍與湘軍同為客軍，若滇、桂軍被鎮壓，湘軍前途如何、將來是否也會遭遇同樣命運，這也是其他駐粵客軍共有的顧慮。蘇俄軍事顧問觀察到：在平定滇桂軍前，“口口聲聲忠於政府的湘軍和朱培德將軍，只有在看到政府確有決心並把大批忠於政府的軍隊調到廣州之後才有可能公開出兵支持政府。否則，無論達成任何協議，只要看不到政府有勝利的把握，他們就不會出兵，以免吃敗仗。”後經廖仲愷與譚延闓及朱培德會談，譚、朱表示支持政府，贊成公開出兵攻打桂軍；但對出兵攻打滇軍，譚、朱尚有保留，他們動搖不定，是缺乏戰勝滇軍的信心，“譚延闓擔心的是，他正在改編中的軍隊尚不適於作戰，再者，湘軍中雲南籍軍官太多，難保他們戰爭中不叛變”。為說服譚延闓，廖仲愷和加倫多次登門拜訪，反復做思想工作，並向譚許諾：“一俟肅清滇軍，即允許他再組建3個團，使湘軍總兵力達到12,000人。”^⑨最終，譚延闓同意參與平亂行動。6月，湘軍由粵北南下，與從東江回師的東征軍共同平定滇桂軍叛亂，這是廣東政權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7月，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廣東政權加速軍政統一進程，日漸發展壯大。

值得提及的是，儘管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頗為倚重這支湘軍，但對廣東民眾而言，這支湘軍和其他客軍並無區別，都是孫中山、國民黨及廣東政府引入，由民眾養活並禍亂廣東的。蘇俄顧問注意到：廣東“農民以至商人，各階層居民，把對軍隊和軍閥的極端不滿，自然也發洩到政府甚至國民黨身上。他們指責政府，為了自己不倒台而把外省籍軍隊引入廣東，引進之後又駕馭不了他們。政府和政府軍漸漸成了居民的眾矢之的。政府、軍隊和官吏，在人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農民的心目中，成了一路貨色。‘打倒軍閥’成了響亮的口號，人們聽到這個口號，就聯想到國民黨將領及其軍隊。”實際上，孫中山、國民黨、廣東政府與這些客軍將領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微妙。加倫報告稱：“政府根本不能左右廣東省政局，它的一舉一動都受制於將領們，而後者中的大多數又不同意黨的政策，有時甚而對政府的舉措公開表示敵意。”^⑩

四、改造成為“革命軍隊”

駐粵湘軍是從湖南軍隊中分離出來的武裝力量。離湘之前，這支軍隊本就來源複雜，派別林立，官兵矛盾突出，內部問題叢生。彭德懷，1898年出生於湖南湘潭，1916年入湘軍當兵，他晚年憶述，自己當兵的主要動機是因為家庭貧困，那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社會迅速破產，不少自耕農失

去土地和生活依據，投軍閥部隊當炮灰，我也是其中之一”；他還談及湘軍內部矛盾：“我參軍部隊的番號是湖南陸軍第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師長陳復初，旅長陳嘉祐，團長魯滌平，營長劉鋼，連長胡子茂”，師長是反對孫中山派，旅長、團長則是擁護孫中山派。湘軍中尉級軍官、軍士大部分參加過辛亥革命，另有一部分保定軍官學校二、三期學生，擔任排長和見習官等，“他們受到行伍出身的軍官的排擠，一些學生軍官被反走了一批。1917年旅長陳嘉祐、團長魯滌平暗中支持下級軍官和士兵反對北洋軍閥的兵變，陳復初被迫下台”。^④1921年，趙恒惕控制下的湖南因援鄂戰爭失敗，向外擴張地盤無望，湘軍內部矛盾又重新尖銳化，表面上是保定系和士官系軍閥聯盟排除行伍系，^⑤實際上是重新分割省內地盤。1924年（實際應為1923年）秋季，爆發了前者排除後者的武裝衝突，行伍系的魯滌平、謝國光、吳劍學等部數萬人被迫逃往廣東。^⑥

由於湖南內部矛盾激烈，戰事頻發，各方都在擴充人馬以增強自身實力，因此將聚嘯山林的土匪收編為軍隊是常有之事。譚延闓曾命陳嘉祐收編土匪。1917年譚第二次督湘，任陳為步兵第三旅旅長，該旅在護法戰爭中失敗，陳僅以身免。由於自身力量薄弱，譚為擴充實力，命陳招撫湘南綠林，組建“護字營”。該營係招收祁陽四明山土匪編組而成，由陳任司令，“護字營成軍後，綠林習氣一時很難革除，殺人越貨之事，仍有所聞，百姓苦之。”對此，譚責成陳整頓該部。1921年譚第三次督湘，對湖南各部軍隊進行整編，護字營改編為湖南省第六混成旅，仍由陳嘉祐任旅長，移駐湘南之郴縣。^⑦不難想像，如此隊伍構成，湘軍內部問題重重。

這些問題自然延續到駐粵湘軍之中。1923年12月7日，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告知譚延闓，“湘軍在乳源城及龍歸市大掠”，譚聽聞後“為之慨歎”。1924年2月13日，陳嘉祐等人與譚延闓相談，“連日為兵鬧事所惱，時時動氣，細思何為如此”；18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致函譚延闓，說廣州第一區分部被湘軍第五軍（即陳嘉祐部）“強佔駐紮，致礙黨務進行”，請譚令該部擇地遷出；^⑧19日，“日來為護芳（陳嘉祐）軍隊滋事感痛苦已多，故不能更忍也”，“軍隊不守紀律事則殊切至”。3月15日，譚延闓得吳鐵城報告，“拏獲湘軍之收行水者，可惡之至！復函請其槍斃，此蔣慎先所為，立名目以魚肉百姓，尤不可恕，明當盡法懲之。”17日，蔣慎先來陳述此事，譚“以正言斥之，（蔣）初尚抗辯，繼乃屈服，誰令其召集匪徒以貽煩惱者，不能不自咎也”。同日，譚得報告，“沙頭逃兵已歸者二百餘人，則逃卒亦尚二百許，今計謝（國光）軍在北江逃去者，將及千矣，可惜也。”4月3日，譚延闓接魯滌平函，“云前方將有索餉風聲，宜極鎮之”；7日岳森對譚延闓說，“聞湘軍有拉伕事，時聞槍聲，為之不怡。湘軍至粵，百惡並舉，但未拉伕耳，今亦須補足耶。”^⑨從上述譚氏日記所載，顯而易見這是一支問題叢生、不易管束的軍隊，特別是陳嘉祐所部，以致蘇俄顧問都聽聞“（陳嘉祐）第五軍是雜牌軍，很大一部分人來自土匪”。^⑩後來在駐粵湘軍中擔任黨代表的肖勁光，晚年也憶述：湘軍官佐“大部分是舊軍官學校出身，軍閥習氣較重，拉幫結派，欺壓士兵；士兵中大多數是家庭破產的農民、工人和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當兵吃糧，雇傭思想嚴重，又沾染了不少舊軍隊的惡習。官欺兵，兵擾民，紀律很差，戰鬥力也較弱”。^⑪

如何把這樣的軍隊改造為“革命軍隊”，是擺在孫中山和廣東革命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務。1923年12月2日，在歡宴湘、豫、滇、桂、粵諸軍將領席上，孫中山發表演說，講解三民主義，希望各將領忍耐暫時困難，向三民主義奮鬥。他指出：“現在廣東的軍隊，都是各軍佔駐一兩縣，賣煙開賭，搜括錢財，以飽私囊。我以為這樣不過是眼前的行動，馬上當要改良的。”他號召各將領振作精神，明白、信仰主義；並表示要向廣東的軍隊宣傳，“讓這十幾萬兵，都明白我們何以要革命的主義”，把這些軍隊“都造成一種革命軍”。^⑫1924年2月12日，孫中山前往湘軍操場演說軍人要旨，歷三小時

之久。23日視察湘軍駐地，勉勵官兵努力奮鬥，呼籲湘軍變成以一敵百的革命軍，共同擔負救國救民之責；當日下午又赴廣州城北江村慰勞湘軍，告誡：“最要者厥為與是地民團及商團等和衷共濟，共保地方治安，切不可發生誤會。至討賊救國為軍人之天職，願諸兵士為國努力。”^⑥

在沒有軍餉保障，又缺乏組織、紀律等手段配合的情況下，前述簡單的道德說教，效果有限。在軍事行動實踐中，對軍隊改造作用更大。1924年4月至9月，湘軍赴東江討伐陳炯明，由於滇桂軍不配合，加之供給困難、瘟疫流行等原因，湘軍傷亡慘重，並由此造成軍心不穩，不少將士產生回湘之念。9月湘軍調往粵北參與北伐，年底兵敗贛南，不僅傷亡慘重，還導致宋鶴庚、吳劍學、謝國光等將領帶兵回湘，離開了廣東革命陣營。對此，蘇俄軍事顧問辯證總結道：這次北伐的正面意義，首先是再次直觀地使國民黨認識到，試圖通過與某些軍閥合作來反對北方軍閥，利用他們來進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是無益的，有時甚至會威脅國民黨的生存和威望；第二點是湘軍的改組，這次改組直觀地向湘軍將領們證明，軍隊若缺乏統一領導，只能走向失敗。湘軍最終認識到這一點，1925年1月決定將各軍和師整編為8個獨立團，2月著手實施整編。^⑦

置之死地而後生，贛南慘敗後，譚延闓採納方鼎英等人建議，決心整頓湘軍，他在粵北韶關成立“湘軍整理處”，統籌辦理整頓事務。1925年1月25日，譚延闓“開整理處成立會議，魯（滌平）、譚（道源）、方（鼎英）、戴（岳）、陳（嘉祐）、岳（森）為會員，各痛言整理之必要，主張旅以上官盡裁，但留團，取三三制，以八十一槍為連，計湘軍可編八團。設教練處，以將官督任之，以講武堂為改造基礎。全體通過，且有喜色，意者湘軍其有豸乎”。在實際整頓過程中，困難不少，29日譚發現：“人人皆欲當團長而無其實力，又不肯編併與人，不亦大可哀乎。”但是，整編改造工作必須推進。2月3日譚記述：“三師改編三、四、五團，駐南雄，團長成光耀、謝毅伯、廖新甲。九師改編一、二團，駐始興馬子坳，團長朱耀華、羅壽頤。二師改編第六團，駐周田，團長周緯黃。五軍改編第七團，駐董塘，團長朱剛偉。第一、二縱隊改編第八團，駐大橋，團長李韞珩。補充旅改編獨立營，砲兵編五連，另工兵二連，駐韶州……每團每月薪餉公費馬乾藥費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九元五角。”^⑧2月11日，湘軍整理處正式成立。譚延闓所部縮編為8個步兵團、2個獨立營、5個砲兵連、3個工兵連。^⑨

兵敗贛南，湘軍整頓改造，加上孫中山病逝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也促使譚延闓思想有所變化。譚延闓親信石醉六憶述：這時“他（譚延闓）的傷感漸有重視共產派的傾向，並警告我勿為國家主義的國民黨員”；湘軍將領岳森也函告石醉六說：“廣州諸友自畏公（譚延闓）以次對君，均無何隔閡”，石醉六“更相信譚必繼承孫先生的精神，以親俄為政治手段罷了”。^⑩加倫也觀察到譚延闓的變化，“他生性沉著穩健，表現雖不特別積極，卻也力求真心領會新的施政方針。他對各項決議悉表贊成，從無異議。身為政治委員會委員，他對政治委員會的一切指示照辦無誤。差不多每隔一天，他都要拜見鮑羅庭同志，向他請教辯證法和政治事態的發展規律。他還主動地悉心聽取政治報告。令人感到，他願意正確理解和適應中國政治形勢的發展。顯然，他要真心實意地暫時背棄他信仰的孔孟之道（對此，他是深有研究的），轉而信奉政治經濟學。”^⑪譚延闓這些變化，也有助於把湘軍改造為“革命軍隊”。

隨著廣東軍政劇變，駐粵湘軍也不斷改編改造。1925年6月上旬，廣東革命政府平定滇桂軍叛亂，掃除了軍政統一的障礙。6月15日譚延闓在日記中記述：“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實行統一案，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皆發言，余與頌雲（程潛）、益之（朱培德）、嘉倫（加倫）、孫科、梁鴻楷皆有贊同之演說，嘉倫為精詳，梁最簡略。復討論改國民軍廢省號，皆以舉手表決，全體一致。”^⑫7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加速軍政統一進程，旋即組建軍事委員會，委員包括：汪精衛、胡漢

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蔣介石、汪精衛為主席，軍事委員會宣佈所屬各軍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取消以省別為軍隊的名稱。在改編國民革命軍的過程中，蘇俄軍事顧問起到了關鍵作用，為確定每個軍的人數和編制，加倫預先同每個軍進行談判，這項工作從6月16日開始，到7月初尚無最後結果，“每個軍長，每一路軍都討價還價，希望人越多越好，編制越靈活越好”。但是，加倫同譚延闓的談判頗為順利，“談判結果，除原有8個團以外，再增建1個團。9個團編為3個師，組成1個軍，譚延闓任軍長。今後有了武器，逐步達到編制定員。”^⑥

1925年8月，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初步成軍：黨軍改為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建國湘軍改為第二軍，譚延闓任軍長；建國滇軍改為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建國粵軍改為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福軍改為第五軍，李福林任軍長。^⑦這樣，駐粵湘軍成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人事與編制安排如下：軍長譚延闓，副軍長魯滌平，參謀長岳森，副黨代表李富春（中共黨員）。第二軍下轄第4、5、6師，第4師，師長張輝瓚，黨代表李六如（中共黨員）；第5師，師長譚道源，黨代表方維夏（中共黨員）；第6師，師長戴岳，黨代表肖勁光（中共黨員）；1926年春，增設教導師，師長陳嘉祐。湘軍改編為第二軍後，譚延闓仍是軍長，但他將更多精力轉到廣東高層黨政事務上，因此，該軍具體事務由副軍長魯滌平負責。蘇俄顧問觀察到：“他（譚延闓）在第二軍裡很受尊敬，但由於未受過軍事教育，所以該軍實際上由他的副手魯滌平將軍指揮，他只負責一些大的事情。”^⑧

駐粵湘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後，蘇俄式軍隊政治工作也隨之展開。以中共黨員為主的政治工作幹部開始進入湘軍，這深刻改造著這支軍隊。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是政治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上任後主要做兩方面工作：第一，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湘軍改編為第二軍時，全體官兵集體加入國民黨，軍、師、團、營都設黨部，基層黨部設黨小組，李富春到第二軍工作後，著手健全各級黨代表制度，組建軍、師兩級政治部，第二軍下轄三個師的黨代表分別由湘籍中共黨員李六如、方維夏、肖勁光擔任，其中李、方當時已是頗有名望的湖南革命者，肖則是從蘇聯學習軍事歸國不久的湘籍青年革命者。第二，第二軍的軍、師兩級都建立共產黨秘密組織，李富春任書記。共產黨秘密組織開會，傳達黨的文件和指示，發展新黨員。北伐前李富春還從地方招收一大批有志青年，大部分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充實到第二軍各級政治部門。政治思想教育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在李富春等人看來，對第二軍軍官的教育，突出要解決的是“私人私槍觀念”，他說：“如果將私人私槍的難關打過，其餘一切改造湘軍的問題，均可迎刃而解”。經過努力，第二軍改造工作取得了相當成效，李富春在一份報告中寫道：這支“昔日行軍時，拉伕、籌餉、搶劫、騷擾無所不為的湘軍現已成為‘頗受民眾歡迎’的革命軍隊”。^⑨經過改編改造，第二軍中下級長官中有很多中共黨員，該軍受共產黨影響很深。^⑩

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肖勁光是湘軍改造工作的重要執行者，他晚年憶述：調入湘軍工作後，首先抓了這麼幾件事：一是宣傳三民主義，主要講解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道理；二是宣傳孫中山的遺囑，以灌輸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三是對部隊實行民主政〔改〕造，實行經濟民主，不准扣兵餉，不准喝兵血，廢除肉刑等封建制度，提高士兵執行紀律的自覺性。師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和各級政工人員、共產黨員，經常深入部隊，主要做下級軍官和士兵的教育工作，使他們覺悟、進步，成為發展革命力量的基礎；對同級官佐主要做團結工作，在團結的基礎上施以革命的影響，爭取他們。經過教育，大部分下級軍官和士兵了解了自身所處的地位，了解了三民主義、三大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意義，逐漸懂得了為什麼打仗的道理，有了初步的革命要求……當然，“在當時要想對部隊實行徹底改造是不可能的。軍閥部隊很講幫派、義氣，動他一兵一卒都行不通。但進

行這些改造,受到士兵的歡迎,上層軍官們感到政治工作有威力,能使士兵積極、努力,聽從指揮,提高戰鬥力,起到了他們所起不到的作用。因而也尊重我們的工作,願意與我們合作,整個部隊面貌有了改變”。^⑩

蘇俄顧問非常關注湘軍改造工作。政治顧問鮑羅廷多次到湘軍發表演說,推進改造工作。他指出:“軍隊為什麼要‘政治工作’?就是要訓練軍隊,去與‘人民合作’,‘政治工作’要使人民了解去打仗的目的。”^⑪軍事顧問加倫更是對此高度關注,認為該軍優點與缺點並存,經歷巨大困難和傷亡後,經過改造可以逐漸變好。他寫道:“普遍都說湘軍組織得不好”,譚延闓與該軍將領們的關係不大好,譚本人不是軍人,他“對哲學和孔夫子比軍隊問題更在行”;湘軍佔據粵北貧瘠地區,物質條件極其惡劣,儘管有廣東政府支持,軍需供應狀況依然不容樂觀;軍中的衛生狀況令人擔憂,湘軍不適應炎熱的氣候,患病率很高,駐紮廣東期間約有 8,000 人死亡,(1924 年 9 月)北伐前夕軍中有近 5,000 人生病;民主主義在湘軍當中十分盛行,士兵與居民關係非常好。在了解這支湘軍的基本情況後,加倫表示:“我們發現這支軍隊並不是那樣糟糕,在俄國顧問的幫助之下,它將變得越來越有戰鬥力。”^⑫

不可否認,第二軍確實朝“革命軍隊”的方向演變,但離真正的“革命軍隊”還有相當的差距,仍是一支具有濃厚湖南地域色彩的武裝力量。其實,這也是廣東客軍經過改編、改造後的共性。由朱培德滇軍改編而來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雖經以中共黨員為主的大批政治工作人員進駐,整頓了軍風軍紀,改造成效顯著,但總體上依然是一支雲南地域色彩濃厚的武裝力量。^⑬蘇俄軍事顧問也承認:從表面上看,國民革命軍是一支統一的軍隊,但內部改組工作並未完成,“在由過去的‘盟軍’改編過來的那些軍中,分裂主義尚未根除(第一軍——黃埔軍除外)。它們的名稱改變了,但本質上沒有多大的變化。湖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二軍中去,雲南籍的軍官想到第三軍中去,廣州籍軍官則想到第四軍中去。”^⑭

結 語

1924 年 12 月 7 日,加倫在致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的信函中指出:“僅僅依靠工農運動和進步的商民就想守住並控制廣州,希望渺茫。軍事力量才是決定廣州命運的基本力量。廣州的最終力量可分為兩類:一是外來者,係為追逐官祿;二是來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者。”據此,他將范石生滇軍第二師及部分外地友軍歸入前者,將許崇智的粵軍與黃埔(校軍)視為後者,並指出前者掌控了大部分稅收來源,故武器裝備精良,後者則僅能支配縣、省的次要稅項。^⑮加倫此處所言“軍事力量才是決定廣州命運的基本力量”,雖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當時廣東革命與戰爭交織格局的核心癥結,但其將駐粵軍隊簡化為兩類,則未免失之於絕對化。事實上,不少外來客軍介於二者之間:既屬外來者,不免有逐祿自存的一面,同時亦投身國民革命運動。譚延闓及其所部湘軍,即是典型例證。

譚延闓自清末以來,既是湖南政治的代表人物,也是全國立憲派首領之一,他與孫中山並沒有多少交集和共識。然而,在民國初年的政局變動中,各方勢力不斷分化重組,譚延闓與孫中山逐漸接近,1923 年後成為孫的追隨者。孫中山需要借助譚延闓在湖南的深厚人脈資源與政治基礎,而譚延闓也需要孫中山這樣的全國革命領袖的引領。1920 年代上半期,湖南成為南北競逐和軍政紛爭中的“搖擺”省份,它倒向何方,將直接影響最終結果。在孫中山支持下,1923 年 7 月譚延闓重返湖南,與傾向北方的趙恒惕爭奪湘政,雖然未達目的,卻成功將一支三萬餘人的武裝力量帶出湖南,形成“駐粵湘軍”,為孫中山和廣東革命陣營注入了新的軍事力量,也因此奠定了譚延闓在廣東政

權中的崇高地位。

帶著謀生圖存的現實考量，譚延闓率所部湘軍入粵，既深刻改變了廣東軍政格局，也大大改造著這支湘軍。一方面，這支部隊深度參與了救援廣州、粵北南雄始興之戰、東征陳炯明、北伐贛南及平定滇桂軍叛亂等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另一方面，這些軍事行動既深刻改變了廣東既有的軍政結構，也使湘軍自身在戰爭和革命的實際鬥爭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補給匱乏，軍餉無著，疫病流行，缺醫少藥，加之戰場失利，傷亡慘重，軍心動搖，逃亡者眾，處境極為艱難。據統計，“相從出死入生之湖湘子弟，前後死亡達兩萬人”，^④從剛入粵時三萬餘人，一兩年後銳減至萬餘人，可見其生存環境之艱險與鬥爭之殘酷。

置之死地而後生。在內外交困中，譚延闓決心對湘軍進行整頓和改造。1924 年底兵敗贛南後，1925 年初譚延闓成立“湘軍整理處”，著手縮編與改造，初具成效。同年 6 月，廣東革命政府平定滇桂軍叛亂；7 月，廣州國民政府成立，軍政統一進程加速。在蘇俄顧問統籌安排下，統一整編各部，取消地域軍隊界限，國民革命軍初步成軍。譚部湘軍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中央向這支湘軍派駐以中共黨員為主體的政治幹部，意在將其改造為“革命軍隊”，成效顯著。無可諱言，改造後的湘軍與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軍隊”仍有相當距離，其總體上依然是一支具有濃厚湖南地域色彩的武裝力量。但不管如何，這支從湖南分離出來的軍事力量，幾經周折、改編與改造後，最終匯入南方革命陣營，成為 1926 年廣東革命政府北伐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

①④③④⑤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 10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7 年，第 5079 頁；第 5063~5064、5123~5124 頁；第 5435~5436、5470~5471、5549 頁；第 5161、5184 頁。

②劉鵬佛：《譚延闓與民國政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79 年；應未遲：《嶽峙淵渟——譚延闓傳》，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8 年；成曉軍：《譚延闓評傳》，長沙：岳麓書社，1993 年；劉建強：《譚延闓大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年等。以《譚延闓日記》為核心史料編纂的資料成果，主要有劉建強編著：《譚延闓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 年；以《譚延闓日記》為主要史料的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有：賀永田：《譚延闓三主湘政與清末民初政局》，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年；周志永：《近代政治轉型中譚延闓的人際關係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 年；石啟賢：《近代政局變動中的譚延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4 年等。譚延闓相關研究論文更多，在此不一一論列。

③劉高葆：《譚延闓系湘軍與廣東革命政權（1923~

1926 年）》，載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編：《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改革》，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年，第 357~401 頁。

④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第 500~501 頁。

⑤⑧⑩⑬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9 冊，第 299 頁；第 289、300、307 頁；第 329、293、332、351 頁；第 400 頁。

⑥⑦③肖山河主編：《石醉六集》，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6 年，第 67 頁；第 68 頁。

⑦②②《聯省自治前後——湖南參議會趙恒惕議長訪問紀錄》，台北：《口述歷史》，第 1 期（1989 年）。

⑨②⑦④④戴岳：《譚趙戰爭親歷記》，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 集第 6 輯，1982 年。

⑪⑪②①③陶峙岳：《陶峙岳自述》，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4 頁；第 28~31 頁；第 34~35 頁；第 21、23、28 頁。

⑫⑫③④⑤③④⑥⑥桑兵主編：《孫中山史事編年》第 9 卷，第 4739 頁；第 4878 頁；第 4882 頁；第 4939 頁；第

5007~5008 頁;第 5005~5006 頁;第 5032 頁;第 5021 頁。

⑭劉壽林等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140 頁。

⑮⑲⑳㉑㉒㉓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0 冊,第 60 頁;第 71、73、79、131、158、192 頁;第 205、209~211、215、223 頁;第 252~260 頁;第 321、326、336 頁;第 352 頁;第 408 頁。

⑯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122 頁。

⑰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南省志》第 30 卷(人物志)上冊,長沙:湖南出版社,1992 年,第 688~691 頁。

⑱㉑方鼎英:《一九二三年譚趙戰爭與湘軍入粵》,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 3 集第 6 輯,第 55 頁;第 64 頁。

㉒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 8 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 19 頁。

㉓《大元帥以猛力毅進勉譚延闓》,廣州:《廣州民國日報》,1923 年 9 月 3 日。

㉔㉕㉖丁文江:《民國軍事近紀 廣東軍事紀》,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 179 頁;第 179 頁;第 177~178 頁。

㉗㉘㉙㉚㉛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1 冊,第 20 頁;第 27、41 頁;第 170 頁;第 544~545 頁;第 53、217、228、230、292、297~298、343、354 頁。

㉜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 年,第 568 頁。

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阿納斯塔西婭·卡爾圖諾娃編:《來到東方:加倫與中國革命史料新編》,張麗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52 頁;第 116 頁;第 74 頁;第 268~269、276 頁;第 44、66 頁;第 116 頁;第 75~76 頁;第 377 頁;第 373~374 頁;第 116 頁;第 35 頁。

㊹㊺㊻㊼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2 冊,第 264 頁;第 343~344 頁;第 474、477 頁;第 532、541、551~552 頁。

㊽朱傳譽主編:《譚延闓傳記資料》第 2 輯,台北:天

一出版社,1979 年,第 206 頁。

㊿《蔣介石日記》,1925 年 1 月 3、6 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㊿㊿彭德懷:《彭德懷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6~7、25 頁;第 13 頁。

㊿士官系、保定系、行伍系,指湘軍中不同出身的軍官派系。士官系指由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軍官;保定系指由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的軍官;行伍系指由士兵出身的軍官。

㊿《中秘處致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函》(1924 年 2 月 18 日),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漢口檔案,檔號:1872。

㊿㊿《肖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年,第 44 頁;第 44~45 頁。

㊿李寶明:《國民革命軍陸軍沿革史》,北京:中華書局,2018 年,第 7 頁。

㊿譚延闓:《譚延闓日記》第 13 冊,第 338~339 頁。

㊿韓信夫、姜克夫主編:《中華民國史 大事記》第 4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第 2281 頁。

㊿㊿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李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63 頁;第 150 頁。

㊿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第 39~44 頁。

㊿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奚博銓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年,第 129 頁。

㊿《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第 29 頁。

㊿陳紅民等:《朱培德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年,第 72~77 頁。

㊿應未遲:《嶽峙淵渟——譚延闓傳》,第 42 頁。

作者簡介:李在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近代以來中國歷史學知識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101

[責任編輯 陳志雄]